

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与实践辨析〔*〕

——与高金岭先生商榷

○ 朱 墨¹, 朱 洪²

(1.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2.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高金岭先生在《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一书中,探讨了朱光潜翻译西方美学问题,是学界难得的关于朱光潜翻译思想的专门著作,但其书及相关论文中若干观点和表述,仍然有可商榷之处。如何看朱光潜在“文革”中翻译黑格尔《美学》的背景、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朱光潜的学术路径及翻译中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商榷。

〔关键词〕朱光潜;美学;翻译;治学路径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2.011

朱光潜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和政治家。作为翻译家,朱光潜翻译了 300 万字的作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十余年来,出现了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研究的良好势头。其中,高金岭先生不仅发表了数篇研究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的论文,还发表了关于朱光潜的美学翻译思想的专著《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些论述或表述,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

一、“突破了极左政治的限制”的观点值得商榷

高金岭先生“以朱光潜 1949 年后的学术历程为个案,考察了翻译与其美学

作者简介:朱墨(1985—),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朱洪(1957—),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美学视域下朱光潜翻译思想与治学特色研究”(编号:SK2016A0569)的成果。

研究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自我改造、建设和再创造的一种有效手段,翻译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一种话语权利。作为唯心主义美学向马克思主义美学转型的代表,朱光潜以翻译为手段,突破了极左政治的限制,译介了大量西方美学经典著作,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不仅延续了其学术生命,而且为中国美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1]

朱光潜在1949年以后,一度处于被监管的对象,他的职务被拿掉,不能像过去一样随意写作和发表文章了,大量的工作被安排为讲课。的确,朱光潜一度很痛苦,因为他本人非常喜欢写作。但能不能说,朱光潜是“以翻译为手段,突破了极左政治的限制”呢?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值得推敲。因为1949年以后,朱光潜从事的翻译活动和著述,大都是有关部门和领导安排的,都没“突破极左政治的限制”。如:

1.任亚太和平会议翻译顾问。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朱光潜因为参加过国民党,一度被军管。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朱光潜通过了检查。1952年秋天,朱光潜接到通知,让他出席10月2日—13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任翻译顾问。他所以能出席此次盛会,表明他已通过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考验,不仅可以继续在北大教书,还可以为新中国做更多工作。

2.1962年翻译西方美学著作。1962年,朱光潜为了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了一批西方美学名著,目的是为《西方美学史》服务,既补充撰写《西方美学史》的材料不足,也为了校正已经翻译的著作的准确性。其中包括翻译普洛丁的《九部书》第六卷、但丁的《论俗语》、达·芬奇的《语录》等。朱光潜为什么翻译西方美学著作?根本原因是高教部教材委员会这一年年初在杭州会议上决定让朱光潜编写《西方美学史》。可见,他1962年翻译西方美学著作,同样没有突破所谓“极左政治的限制”。

3.“文革”中从事翻译活动。1970年,出“牛棚”后的朱光潜已经七十四岁,年老体弱,不用上班、讲课了。就在这时,北大需要人翻译材料,有人想到了朱光潜。于是,他到这里继续“接受改造”。1973年冬,朱光潜接受任务,参加翻译联合国安理会文件的工作,这是国务院文教组分配给全国部分大学的任务,打算花几年译完。朱光潜不仅自己翻译,还要负一部分校改责任。可见,朱光潜这时期的翻译工作,并非是“突破极左政治的限制”。

4.“文革”中翻译黑格尔《美学》。“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抄朱光潜家,将他在解放后陆续译出的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以及黑格尔的《美学》第二卷书稿等,全部抄走了。抄家确实是一种“极左政治的限制”,朱光潜在“文革”中,继续翻译黑格尔《美学》第二、三卷,是不是突破了所谓“极左政治的限制”呢?事实上,他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是在得到翻译组负责人的赞成后进行的。1973年11月5日,朱光潜给章道衡写信说:“三年前即正式得到解放了。领导上指示我把黑格尔的《美学》译完。”^[2]可见,朱光潜

1970年翻译黑格尔《美学》，是在“领导”指示下进行的。

5.1976年翻译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1976年，朱光潜在翻译好黑格尔《美学》第二、三卷后，翻译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这个工作，并非是朱光潜本人的选择，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西语系给朱光潜的任务。朱光潜不顾唐山地震的余波，继续翻译这本书，是因为他打算本学期完成翻译工作，作为自己正式工作的一部分。可见，这项工作也不是“突破极左政治的限制”。

总之，1949年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政治环境是整个生态环境的一部分，生活在该阶段的知识分子，无论做什么，事实上都是在“改造”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而不可能去“突破”政治环境，让政治环境去“适应”自己。朱光潜解放初虽有苦恼，也一度很不适应，但经过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逐渐地适应了新中国的政治环境。换句话说，他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十七年间所从事的全部翻译活动和著述，几乎都得到了领导机关（“政治”）的支持。他在“文革”环境下悄悄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是一个例外，但因为不能出版，又从反面说明，他自己“突破”不了所谓“极左政治的限制”。

二、“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说法值得商榷

高金岭、华志全先生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赞助人对译者与译本进行不同形式的严密操纵；同时，译者也通过对翻译对象与翻译方法的精心选择，引进新的理论观点与材料，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3]

认为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著作是“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那么，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1.帮助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1962年1月，朱光潜在《新建设》1月号发表了《怎样学习美学？答青年同志们的来信》。朱光潜反对读二手资料，不读原著，而读转述的东西，易造成思想混乱。那么，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点呢？朱光潜认为，必须从经典原著里去学。其次，要学习美学史。“在西方，美学著作虽是浩如烟海，真正的历史上起重大影响的只有几部著作，例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和黑格尔的《美学》”^[4]

可见，朱光潜热心翻译黑格尔《美学》，本意很清楚，是帮助读者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不是“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2.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美学，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将翻译黑格尔《美学》的任务交给了朱光潜。1959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革”开始后，朱光潜已经翻译好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书稿被北大造反派抄家时抄走。北大校长也因为支持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成为其“包庇、重用反动学术权威”的“重要罪证”之一。1970年—1973年，朱光潜悄悄的翻译黑格尔《美学》第二、三卷，本质上是继续完成周

总理交给的翻译任务。可见,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虽然有悖“文革”时的风气,但本意并非“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3.帮助读者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1970年,一位年轻的同志问朱光潜,为什么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朱光潜说:“了解黑格尔的《美学》,有助于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因为《美学》是用艺术发展的具体事例来阐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及其辩证法的,比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具体易懂。此外,黑格尔《美学》的文笔很美,简明流畅。恩格斯在1891年11月写信给康·斯米特说:‘为消遣计,我劝你读一读黑格尔的《美学》,如果你对这部书进行一点深入的研究,你就会感到惊讶。’”

这段话说明,其一,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的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其二,恩格斯在信中劝自己的同志读一点黑格尔的《美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鼓励读者去研究黑格尔《美学》。

总之,朱光潜无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或是在“文革”中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并非“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在帮助读者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的《美学》,“文革”前得到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的支持,“文革”中得到翻译组组长和同事们的支持。事实上,他的翻译工作与“主流意识形态”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美学》翻译好了后,1973年,朱光潜将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倘若朱光潜翻译该书“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刚恢复印书业务的商务印书馆是不敢在1973年与朱光潜洽谈出版该书的,也不能在1978年3月即排印该书。

三、朱光潜的学术路径是教学、创作、翻译、研究四合一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思想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选择的是一条把学习、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术路径,他在完成自己美学体系的同时,也翻译引进了一系列西方美学代表作”。^[5]

笔者认为,朱光潜的学术路径是教学、创作、翻译、研究四合一的,不能离开教学和创作两个环节。

1.学术路径中的教学环节。自朱光潜治学道路来看,他的一生除了读书,都是在学校教书。1916年年初,朱光潜在桐城中学毕业后,即到桐城县大关小学堂当小学教师。1923年秋,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英文教师,兼上海大学逻辑学讲师。1924年,任白马湖春晖中学英文教师。1925年春,任上海立达学园教师。20世纪30年代起,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师,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回北京大学任教。其在小学、中学、大学教书经历长达七十年。因此,他的治学道路中,有大量的教学实践和经验。我们概括朱光潜的治学路径,不能忽略其“教学”的环节。

2.学术路径中的创作环节。自朱光潜治学道路来看,他除了读书、教书,其他时间主要是写作和翻译,少量的时间是参加会议和社会活动。他在欧洲留学

期间,完成 8 部著作,即《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文艺心理学》《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变态心理学》《诗论》《符号逻辑派别》,其中《符号逻辑派别》交商务印书馆,在抗战中遭焚。解放前,他出版了《谈修养》《我与文学及其它》《谈文学》等。解放后,特别是晚年,他的创作活动达到巅峰,成为当代高产作家之一。

高金岭先生探讨朱光潜治学路径,谈了学习、翻译与研究,没有提创作。作为桐城派作家的继承人,“创作”在朱光潜治学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学术路径的具体实现形式。朱光潜实现自己的学术路径,如前所述,是教学、创作、翻译、研究四位一体的,其具体的实现过程,即此四点互相渗透、相互作用的过程。的确,没有翻译,就不能成就其美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没有翻译作为铺垫,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英语教学工作也大受影响;没有其大量的翻译工作,其创作活动也相形失色。但另一方面,他对于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他的英文教学等,反过来对他的翻译事业,又起了推动作用。如他为了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了不少西方美学著作。可见,朱光潜的学术路径的具体实现形式,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翻译,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谓“变译”。

四、朱光潜的翻译特色和学术路径并非“变译”

高金岭先生以朱光潜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的一部分为例,得出朱光潜翻译特色和学术路径是“变译”。高先生举出朱光潜在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艺术即直觉说”一段,认为朱光潜的翻译和原文比,有的地方分段不一致,出现了加词,去括号,省略,增加标题,增加注释等。“朱光潜运用的其他变译手段还包括编译、阐释、摘译与译述等”。^[6]

尽管高先生具体地分析了朱光潜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的一部分,指出朱光潜有所谓“变译”依据,但仍然不能说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是“变译”。因为:

1.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的原则。朱光潜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的主干,或者绝大部分内容是直译,即忠实于作品的原貌。朱光潜虽然增加了必要的“注释”,也是翻译者忠实原著的一部分。朱光潜在必要的地方,偶尔加一点阐释、译述、综述,符合朱光潜一直主张的翻译原则,即为了读者明白原著,作一点必要的解释。总之,其本意仍然是更好的忠实于原著,而不是“变译”。

2.应全面研究朱光潜的翻译著作。朱光潜一生翻译事业可分为两个阶段:(1)欧洲留学时期,翻译了法国柏地耶的《愁斯丹与绮瑟》、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2)1949年10月至1986年去世前,翻译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普洛丁的《九部书》第六卷、但丁的《论俗语》、达·芬奇的《语录》、黑格尔的《美学》、维柯的《新科学》等。高金岭先生在概括朱光潜翻译特色时,仅仅以朱光潜早年翻译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作为分析对象,显然是不够的。

3.朱光潜本人的总结。什么是变译呢?高金岭先生举例说:“而漏译、改译和删节在中国近现代对西方美学的翻译引进中,则是较普遍的现象,而且是受到

肯定的。”^[7]但这个观点是朱光潜本人的观点吗？高先生在书中大段引述了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却没有用朱光潜先生本人的话作为依据，这样张冠李戴的论证方式，倘若朱光潜先生在世，他能接受吗？

事实上，关于自己的翻译特色，朱光潜本人有明确的总结。1955年，朱光潜给老舍写信说：“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的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文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8]对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翻译，针对译者将原文随意的翻译，朱光潜曾批评译者“是太不忠实于原文了”。可见，朱光潜既不同意死板的“直译”，也不同意随意的翻译，包括所谓“变译”。

4. 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朱光潜的翻译特色或方法，主要是直译，即尊重作者的原意，在不好理解原意的情况下，做必要的注释，甚至加一点原文没有的话，帮助读者去理解原文。举几个例子：(1)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的《美学》采取的就是直译的方法，加必要的注释；(2)1980年年初，申奥将翻译意大利汉学家沙巴蒂尼的《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一文寄给朱光潜。朱光潜对于直译不易理解的地方，增加了一两句原文中所没有的话，使文章通顺，也便于读者深刻领会原意；(3)晚年翻译《新科学》，增加许多注解，包括夹注、脚注，便于读者去了解作者所传达的深奥的道理。

可见，朱光潜主张直译，但直译是“文从字顺”的而不是死板的直译，直译不要留下直译的痕迹。其翻译的特色，首先是尊重原文，让读者明白原文，在直译不能尊重原文的情况下，增加注解，即偶尔增加原文所没有的话，目的是便于读者了解原文的话。但这个翻译特色，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所谓“变译”。

五、“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心主义美学体系”观点值得商榷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一生的学术研究“从1949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朱光潜前期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主要理论来源，综合心理距离说与移情说等各种当时最新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心主义美学体系”。^[9]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在解放前形成了自己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值得商榷。

1. 解放前主要介绍西方美学家的观点。朱光潜解放前从事美学研究，主要是介绍西方美学家克罗齐等人的观点。朱光潜1924年写了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表现了对美学的兴趣。上世纪20年代末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选修了《美学史》课，热衷研究美学。1929年，他撰写《文艺心理学》，翻译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1945年，针对梁宗岱批评自己把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签为己有”，朱光潜写文章反驳说：“我是一个整理阐发者，从来没有说《文艺心理学》是我的独创。”^[10]1947年春天，朱光潜写《克罗齐哲学述评》，介绍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仍然是介绍克罗齐的思想。

解放前，朱光潜在西方接受了克罗齐等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影响，作品中有

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过去对于美学工作,大半介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

2.解放后对朱光潜美学研究的曲解。解放后,不少人批评了朱光潜在解放前的美学著作。如1949年冬天,蔡仪和丁进公开写文章,批评朱光潜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朱光潜写《关于美感问题》承认,《谈美》和《文艺心理学》是20年前在欧洲写的,“现在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过偏的”。^[11]另一方面,朱光潜明确说,《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中的错误,“或是我所介绍的学者们就已经错误,或是我把他们介绍错误了”。^[12]

又如1956年,贺麟在《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一文中批判克罗齐、朱光潜的“艺术即直觉说”“直觉即创造说”“直觉即表现说”“移情说”等。^[13]这些批评,同样是把朱光潜的介绍克罗齐的思想,当成朱光潜本人的思想。早在1949年,朱光潜在反驳蔡仪和丁进的文章中就声明,所谓“移情说”“距离说”,并非他本人的发明,这个观点是别人的,他仅仅是介绍。“批评的人们对于这一方面未免太忽略了”。^[14]

3.朱光潜形成美学体系的时间。朱光潜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与其解放后参与的美学争论有关,有一个形成过程。(1)50年代,朱光潜在美学争论中,提出美学是主观和客观统一;(2)1956年12月25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此文表明,朱光潜“转守为攻”,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当代中国美学中存在的问题;(3)1958年1月16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美就是美的观念吗?——评吕荧先生的美学观点》,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批评美学中存在的“主观”问题;(4)1958年冬天,朱光潜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答李泽厚、洪毅然两同志》,坚持自己《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的观点,肯定美的意识形态性,否定美是自然物的一种属性,等等。

总之,朱光潜在解放前受到克罗齐等人影响,在介绍他们的观点时,有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地方,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在上世纪50年代末美学大辩论中,朱光潜首先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加到美学大辩论中,形成了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为代表的三个美学派别。在回答美是什么问题上,一家认为美是纯客观的(李泽厚);一家认为美是纯主观的(蔡仪);一家认为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朱光潜)。正是在这个辩论中,朱光潜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

六、“研究成果”多样性

高金岭先生认为,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为学术服务,是辅助性的。后期则以打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联为要务,翻译引进了一大批美学经典与哲学经典著作,其美学研究成果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为翻译服务。”^[15]

高先生说朱光潜“研究成果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为翻译服务”,值得商榷。

1.“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一方面,朱光潜在翻译作品的前后写序、跋、前言等,介绍自己翻译的背景、目的、方法,以及翻译内容的介绍,包括翻译过程中的研究心得。另一方面,朱光潜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翻译作品的“序、跋或前言”,如他单独写的许多有关美学的文章,他写的美学专门著作,包括《文艺心理说》《诗论》,以及他与别人论辩的文章,甚至一些讨论美学的私人信件,都渗透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研究心得。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朱光潜翻译中的研究成果,仅仅是以“序、跋或前言的形式出现”。

2.“研究成果”作用的多样性。朱光潜翻译西方美学著作,是翻译与研究过程的统一,作为美学家和翻译家,他在翻译中的研究成果,包括心得体会,不仅是高先生说的为“翻译服务”,也为美学服务。他翻译西方著作,有多种目的,如:(1)为撰写《西方美学史》服务;(2)为了解西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服务,如翻译黑格尔的《美学》;(3)为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服务,如翻译维柯的《新科学》;(4)为建立当代中国的美学体系服务,等等。这些目的,往往交叉。在朱光潜的翻译和研究中,翻译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本身。可以说,朱光潜首先是一个美学家,其次是一个翻译家。在朱光潜的全部著作中,他的翻译是为美学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朱光潜的学术遗产非常丰富,尤其是他的美学和翻译思想,值得后人悉心消化和学习。当前,我国关于朱光潜思想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时期,一些探讨还不够完善,朱光潜美学翻译思想值得学界的长期关注和探索。

注释:

[1][9][15]高金岭:《翻译与政治——1949年后朱光潜西方美学的翻译与政治关系初探》,《上海翻译》2008年第2期。

[2][4][8][11][12][14]《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28、341、38、1、2、2页。

[3]高金岭、华志全:《主流意识形态对黑格尔〈美学〉翻译的操纵——朱光潜译介黑格尔〈美学〉个案研究》,《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5]《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简介),《外国语言文学》2009年第1期。

[6][7]高金岭:《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4、58页。

[10]《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

[13]贺麟:《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人民日报》1956年7月10日。

〔责任编辑:刘 臻〕